

中國的崛起與東亞安全

• 傅高義



當我們放眼展望二十一世紀，大概沒有甚麼變化對世界所造成的衝擊，可以和中國的崛起相比。可以預見，中國在今後一、二十年間，極可能出現空前的經濟增長和相應的國力擴張。因此，中國如何適應國際秩序，世界又如何調整其秩序以適應中國，就將成為人類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和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以接近10%的年平均速率成長，改變了世界商貿和勢力的性質與面貌。歐美消費者購買亞洲工業製品數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本國工業就只剩下空殼子。在西方羽翼下成長的東亞國家，現在反而成為國際援助和資金的供應者了。日本和四小龍的人口加起來不到兩億，大約只及中國的1/6。如果中國繼續以相類的速率增長，那麼我們就行將目睹前所未見的財富和勢力轉移。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和主宰鄰近地區達幾世紀之久的文化，賦予她與眾不同的信心，以及在世界事務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

可以想像，內部動亂、貪污腐敗、通貨膨脹、經濟政治管理失當，或中央權力下放，都會阻礙快速成長。然而，大規模技術轉移、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升、高儲蓄和投資率、嶄新物質和社會基礎設施的廣泛建立、現代生產設備的引進、進入世界市場、和5,000萬準備貢獻力量的華僑，這種種因素又可能令中國的高速成長持續數十年。

另一個共產大國蘇聯已經土崩瓦解，但蘇聯是在十九世紀才結合起來的，而中國早在兩千年之前已一統立國了。此外，少數民族佔蘇聯人口一半以上，在中國則約只有6%。中國共產黨也和蘇聯共產黨不同，前者在趕走外國勢力、取消外國租界、重振民族尊嚴和造就經濟成長各方面，是很得民心的。而且，許多中國人對於鴉片戰爭後130年的動亂苦難未嘗忘懷，在有機會改善生活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輕率提出可能破壞安定的政治要求的。

中國在今後一、二十年間，極可能出現空前的經濟增長和相應的國力擴張。因此，中國如何適應國際秩序，世界又如何調整其秩序以適應中國，就將成為人類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

中國還不是經濟強國。誠然，倘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為基準來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並且對國產貨品的價值作某些估計，結果可能得出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不久會超越日本的結論。但中國在現代科技、運輸通訊設施、國際投資和貿易、資本資產、對世界經濟趨勢的處理及反應等方面，還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語。在未來幾十年中，即使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某些衡量標準下超過了日本，日本經濟多半仍會執亞洲牛耳。但中國的成長將是驅動轉變的力量，尤其是在亞洲。

一 中國對亞洲經濟的衝擊

(甲) 中國的增長模式

中國還不是經濟強國。倘若以購買力平價基準來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可能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不久會超越日本。在未來幾十年中，即使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日本，日本經濟多半仍會執亞洲牛耳，而中國的成長將是驅動轉變的力量，尤其是在亞洲。

鄧小平在1978年決定推行市場開放和制度改革，不單標誌放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是告別帝制傳統上政府箝制私人經濟發展的分水嶺。取消了公社和集體農業制度之後，私人農業興起。廢除了配給制度和放寬遷居限制之後，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和急速發展的沿海地區。物價漸漸受到市場調節，新興企業得以在城鄉蓬勃發展。控制重工業和大企業的國營機構，亦因逐漸受市場影響而被迫提高效率。

沿海是較便於國際市場進入中國的地區，因此也是經濟增長發軔之地。內陸企業受鼓勵在沿海地區設立工廠和公司，以求與世界經濟聯繫，在國際貿易中分一杯羹。然後，隨着現代道路、鐵路和機場日趨完善，工業急速向內陸遷移。數以千萬計的年輕工人在沿海地區工作幾年之後，帶着他們的積蓄、現代商業經驗和工業技術回到中國內陸。

但是，資金和人才仍然流向沿海地區，因此居住在沿海地區的2至3億人口，其現代化速度遠遠超過內陸。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花了二、三十年完成突破，成為現代化國家，中國沿海地區大概也會在相若時間完成這一過程。但內陸要取得現代化突破，則可能要花上五、六十年。

(乙) 對四小龍的衝擊

對於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中國在1978年的開放來得正是時候，情況一如日本在1960年代國內工資上漲，看上台灣和南韓作勞動密集型生產一樣。新工業轉移到華南始於1980年代，最早開闢的四個經濟特區中，有三個(深圳、珠海和汕頭)位於廣東省。其時，香港就在這裏設立生產紡織品、玩具、鞋子、電子產品的加工廠，其他輕工業也紛紛把生產線遷到中國。

其餘三小龍也受到同樣的經濟壓力，但為着政治原因，反應比較緩慢。台灣政府起初擔心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會被大陸用作政治籌碼；但到了

1980年代後期，由於工業受到很大的競爭壓力，迫使台灣政府對於企業在大陸設廠寬鬆處理，1987年之後更容許人民到大陸旅遊和投資。南韓由於韓戰的歷史而對中國心懷顧忌，然而隨着冷戰逐漸緩和，以及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契機，兩國關係逐步改善，貿易和投資亦開始從南韓流向中國。至於擁有大量華人公民的新加坡，因為希望和各大強鄰保持良好關係，所以直至印尼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後，她的貿易和投資才蓬勃起來。到了1990年代，政治顧忌業已消除，三小龍的企業逐漸跟隨香港，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十年之內，這些地區大部分輕工業都可能轉移到中國大陸去。

1970年代後期，日本經歷了石油危機和將生產遷到海外後，成長率急跌。而四小龍由於把大部分生產轉移到大陸，卻仍然能保持高成長率。這或許不單止因為她們覓得了新市場，也因為她們成功地擔當地區服務中心的角色，把中國和國際市場聯繫起來。同時，跨國公司也開始擴大在四小龍的業務以作為開拓中國市場的橋頭堡。

由於中國致力提高科技水平，以避免被地區中間人過份取利，四小龍因而承受很大壓力，被迫在科技和運用世界資訊的能力上力圖保持領先。中國目前還缺乏大量受過國際貿易訓練的人才和跟得上國際大勢的法律，且管理制度落後，因而給四小龍留下暫時繼續領先的機會。

(丙) 對印尼、越南和南亞的衝擊

有些觀察家估計在未來十年(1995-2005)內，中國在基礎設施(包括發電廠、鐵路、道路、海港、通訊)上的投資將高達一萬億美國。這些資金大部分會在國內籌集，但亦會從國外籌集不少數目。因此，亞洲其他擁有大量廉價勞力的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印度等)，將和中國相爭吸引資金和工業投資。同時，這些國家中較為先進的工業和服務企業，肯定也要找尋機會把服務銷售到中國去，但其政策仍會以和中國競爭吸引外資，從而促進本身建設為主。

印尼原本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之中保護主義色彩最濃厚的，但1994年在茂物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蘇哈托(Suharto)大膽提出自由化計劃。這表示印尼已經明白到如果要繼續成長，就必須和中國競爭，吸引國外投資者。越南不管軍方和地方工業的反對，在推行自由化以吸引國外資金上，也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其他情況類似國家的政治領袖亦開始醒覺，迅速朝同一方向邁進。

(丁) 對日本的衝擊

日本是亞洲諸國中最全球化的經濟大國，因此她不那麼依賴中國，她是資金和技術的提供者而不是接受者。

有些觀察家估計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將高達一萬億美國。這些資金大部分會在國內籌集，但亦會從國外籌集不少數目。因此，亞洲其他擁有大量廉價勞力的發展中國家，將和中國相爭吸引資金和工業投資。

日本公司普遍渴望能把產品向中國市場銷售。所以它們在中國各主要城市都設有辦事處，以蒐集有關資料，作為推擴業務策略的根據。雖然日本已逐步退出勞工密集工業，但日本在製造生產設備、高科技和高檔消費品方面的工業能力仍然驚人。因此日本賣到中國市場的貨品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同時又維持向世界其他地區的高額輸出。

對於投資中國市場，日本公司十分謹慎，對中國的高度混亂狀況尤其不放心。中國地方官員的慣於徵收「苛捐雜稅」和各種費用，以及如1980年代初期的寶山鋼鐵廠事件，在日本商界廣泛流傳，使他們對中國投資深懷戒心。中國政府的計劃者自然希望取得最先進的技術轉移，利用國外資金和科技生產出口貨，並把利潤留在中國。但日本公司比其他跨國公司有更長遠的眼光，它們絕不輕易提供技術轉移，惟恐中國會像幾十年前亞洲取得美國技術之後一樣，把出口貨運回技術來源地銷售。但到最後，日本人意識到中國市場的巨大發展潛力，因而忙於擴大他們的商業利益，雖然他們對於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還是相當謹慎的。

對於投資中國市場，日本公司十分謹慎，它們絕不輕易提供技術轉移，惟恐中國會像幾十年前亞洲取得美國技術之後一樣，把出口貨運回技術來源地銷售。

二 經濟關係的政治後果

在殖民地時代，亞洲市場和原料供應由佔領當地的政府控制。現在不同了，各國不再用武力掠奪土地，誰擁有具競爭力的產品就可以進入市場，誰付得起價錢就可以得到原料。因此，對人口眾多的各亞洲國家來說，保持開放市場和穩定局面是利害攸關的。

(甲) 資源問題

或許只有一個地方不在此例，那就是南中國海。假如能源供應變得非常緊張，疆界糾紛仍沒有解決，就難保軍事衝突一定不會發生。不過，中國已提議暫且擱置主權問題，共同開發南海的能源。雖然聲稱擁有主權的各國利益並不一致，但它們都有理由在不動干戈的情況下解決糾紛。

其實，在未來幾十年內，亞洲仍有充足能源來供應持續成長所需。區內各國正在大力開展核能發電；而中國不但煤蘊藏量足以供用好幾個世紀，而且除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之外，中東國家仍會有足夠的燃料供應中國經濟增長之用；俄羅斯也有豐富的礦物燃料可供開發，儘管成本可能不輕。

(乙) 亞洲國家與中國的互動

四小龍和馬來西亞、泰國在經濟上將非常依賴中國，其中香港是最依賴的一員。雖然英國和中國的協議定明，香港的基本制度在2047年前會維持不變，

但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政治的依賴程度會大幅增加。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聯繫急速發展，使得台灣商界向當局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實行三通。但由於台灣政府為了提高國際聲望和開拓國際政治空間，使得它和中國大陸之間關係日趨緊張，甚至可能會演變為武裝衝突。也許最好的可能局面是，海峽兩岸所受的經濟壓力引導出一個既確立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同時又容許台灣至少於今後五十年內，維持政治和軍事上相當程度實質自主的政治方案。

南韓不像台灣那麼依賴中國市場，但貿易總額卻在1994年從接近零上升至120億美元，在1995年達至170億，以此成長速度，在公元2000年就將超過其對美國的貿易額。這顯然會大大加強南韓和中國的政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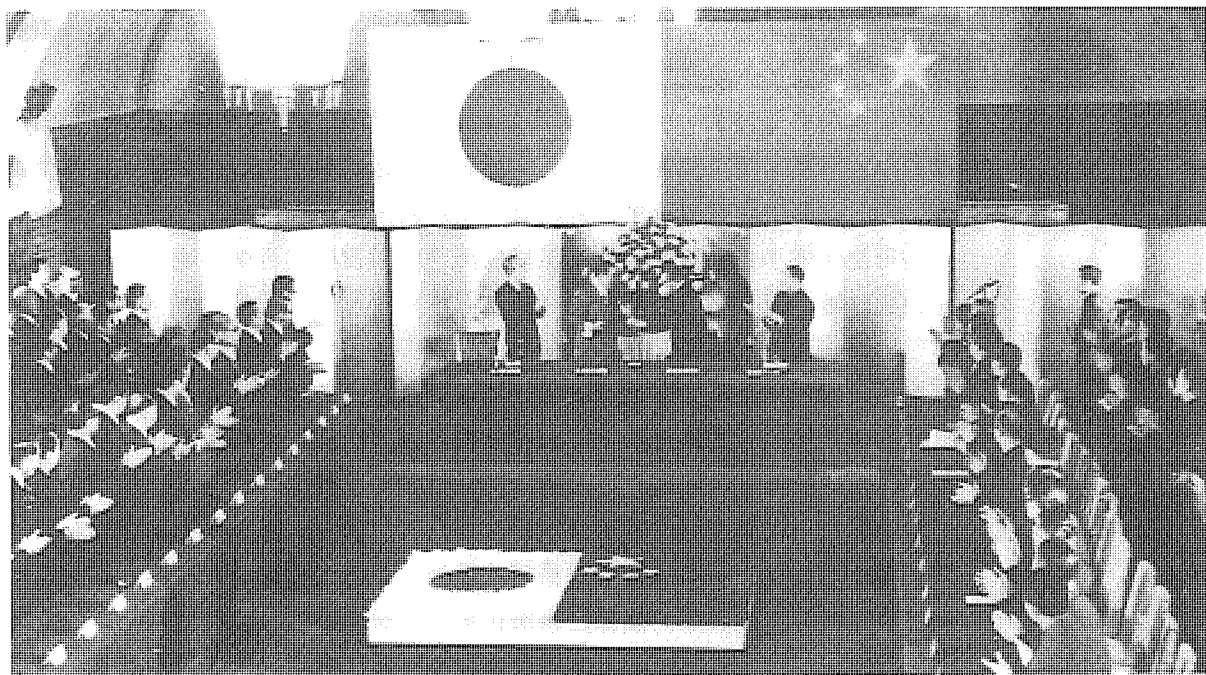
新加坡和中國距離較遠，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也低於其他小龍。但許多中國領導人很想尋找一種有秩序的政治控制領導模式，所以對新加坡的政治發展特別感興趣，因此新加坡與中國建立密切關係的可能性很高，只不過，新加坡尚要顧慮到這對她和鄰邦馬來西亞和印尼關係的影響。

其他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和中國的關係似乎是競爭多於互補，但這多半是從加強本國對國外投資者的吸引力着手，而不會演變為與中國直接衝突。但倘若美國從亞洲撤軍，那麼有些國家開始加強軍備，從而觸發軍備競賽，那是可能出現的後果。

(丙) 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可能是最難處理的政治問題。這兩國在未來幾十年將會充當亞洲龍頭，並且爭奪亞洲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當中國逐漸取得高水平製造技術，

中日兩國在未來幾十年將會充當亞洲龍頭，並且爭奪亞洲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當中國逐漸取得高水平製造技術，造出堪與日本競爭的產品時，經濟競爭就會趨於白熱化。



造出堪與日本競爭的產品時，經濟競爭就會趨於白熱化。日本已經遇到在中國保障其知識產權的問題；中國向日本企業徵收「苛捐雜稅」引起的摩擦亦將越加嚴重。此外，日本政界仍諸多忌諱，不願為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此前的種種作為全面道歉，這就讓中國抓着把柄，和其他受過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國家聯合起來，限制日本在區內的政治企圖。

整體來說，中國領導人曾想運用經濟影響力（尤其是飛機、電訊網絡和設立主要工廠等大型項目上）達到政治目的。但經濟決定權下放給地方及市場後，國有企業和國家計劃掌控的經濟活動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所以中國運用經濟影響政治的能力將會持續減弱。

三 中國軍事現代化與亞洲安全

從70年代末期改革開始，中國領導人就一直推動國防、農業、工業和科技現代化，其間，兵員人數從500萬裁減到300多萬，軍備現代化計劃也在大力推行。若要判斷中國會否威脅到其他國家，則要同時分析中國的軍力和軍事目標。

中國正在增加軍事開支，但很難估計她真正的軍事經費，因為解放軍有許多不同的收入來源，包括企業，而中國一直沒有公布這方面的詳細數據。無論如何，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中國國防科技仍然落後。中國雖有核子武器、飛彈和大批常規武器，不過她的飛機船艦質素並不高。中國還沒有航空母艦，也不見得能在公元2005年之前造得出來。至於中國的通訊科技則更落後，所以軍事指揮和控制功能遠不如日本、北約和美國等現代國家。由於這方面的技術相當複雜，中國至少要花二十年以上功夫才能彌補這一大段差距。

中國決心維護對台灣的主權，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中國將不惜動用武力。雖然中國有能力用飛彈摧毀台灣，但這會賠上她和日本、西方的關係，代價委實太高，除非中國被惹火了，否則當不至於動用這激烈手段。至於中國攻佔台灣的可能性更小，因為中國缺乏足夠的海、空力量橫越台灣海峽，勉強出動必定損失慘重，而且不一定能打贏。

中國領導人已清楚表明，在未來幾年中，他們的目標主要是推行現代化，以繼續獲取世界技術、市場和設備，所以她必須跟美國、日本和其他大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如果台灣不一意孤行宣布獨立的話，中國是不會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況且，她還有很多手段可以選擇，例如已經實行的把飛彈演習擴大至台灣領土或其邊緣，這將嚴重阻礙台灣吸引投資，並導致資金外流。雖然過去幾十年前間，中國因邊界糾紛而與蘇聯、印度和越南交戰，但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她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已恢復正常。考慮到中國非常在意國際市場，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衝突會復甦。

中國領導人已清楚表明，他們的目標主要是推行現代化，所以她必須跟美國、日本和其他大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如果台灣不一意孤行宣布獨立的話，中國是不會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

四 安全聯盟的作用

二十一世紀之前，亞洲國家很難達成保障穩定和處理緊急事故的多邊安全協議。要為部隊提供共同訓練和裝備，各國之間必需先有相當的相互理解和合作，這是很難克服的障礙。亞洲以前也下過功夫處理安全問題，結果顯示發展集體安全是多麼緩慢和艱難。東南亞國家在1967年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但成員之間為主權爭奪爆發了衝突，直至1992年才成立東盟區域論壇。反觀歐洲國家，她們面積相近，發展階段相若，同是源自希臘和羅馬傳統，亦有長時間的合作經驗。從她們的經驗看來，東盟國家最少必須花上幾十年才可能建立互信和共同作業的基礎，藉以達成能迅速處理緊急事故的集體安全協議。

至於非東盟國家在合作上的經驗更少。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唯一的全區性組織，但和東盟相比，它歷史更短、組成更龐雜。但即使是亞洲多邊安全協議的成功例子——澳洲、新西蘭和南韓，也都不寄望多邊協議能長期有效處理緊急事故。目前美國這唯一軍事超級大國和個別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和南韓，還有程度較低的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澳洲的雙邊安全關係，是對緊急事故作出反應所必不可缺的機制。

大部分東亞國家人民享受了多年和平，對於冷戰結束甚感欣慰，他們希望能削減本國軍費和裁撤軍事設施，特別是那些由外國部隊駐防的基地。然而，防務專家和政治領袖對於邊界衝突、海盜劫掠和游擊隊活動仍憂心忡忡。北韓尤其難以令人放心，因為她奉行孤立政策，軍力強大，而且有敵意活動的先例。最近她的領導繼任情況不確，經濟又陷入絕境。防務專家亦擔心地位不穩的俄羅斯政府會被好戰派民族主義領袖取代，他們很可能恃強大武器耀武揚威。

大多數亞洲國家已作好準備，歡迎中國在國際組織中擔當更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角色。短期內，那些亞洲防務專家在了解中國的軍力和目標後，沒有人會視中國為威脅。然而，在綜合中國軍事現代化，拒絕停止核試和透露軍力增長狀況、邊界戰爭紀錄、恫嚇台灣和其他聲稱擁有南海主權的國家等情況後，他們卻又很擔心中國在軍事現代化後會遙遙領先他國，並且在沒有強大力量對之加以制衡時，中國真的可能會成為威脅。為了這些原因，也因為東亞各國的防務專家很清楚美國沒有侵佔亞洲土地的野心，所以都希望美國能繼續在亞洲駐軍。否則，許多亞洲國家便會認為有必要加強軍備，使得軍備競賽可能一觸即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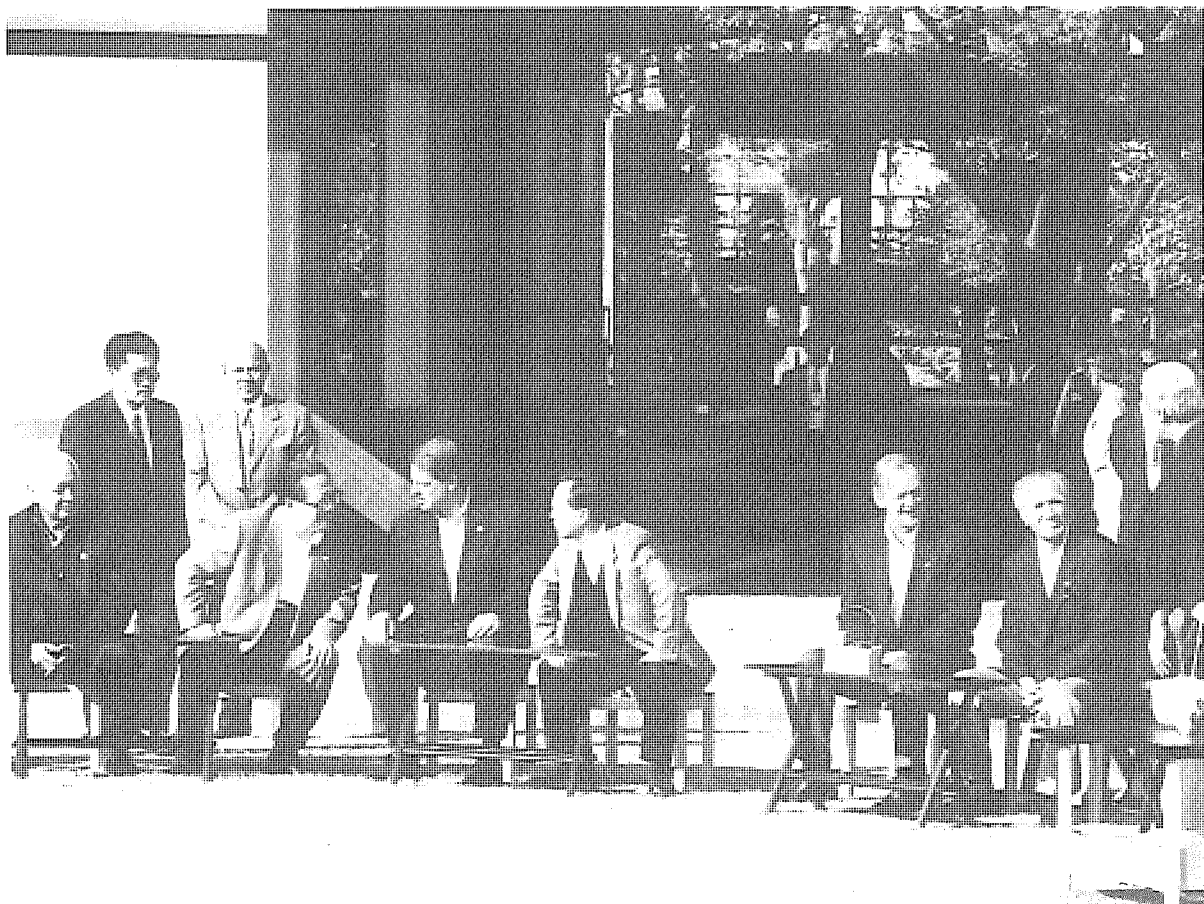
日本政治領袖和防務專家認為繼續和美國結盟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相信自二次大戰以來的半個世紀，這項盟約帶給日本不少好處。否則，軍費必將激增，而經濟成長率則會放緩，由於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需要增加社會服務，因此他們預算限制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獨自加強軍力會激怒那些不曾忘記1945年之前日本種種作為的亞洲國家，這將帶來不利經濟和政治的後果。

二十一世紀之前，亞洲國家很難達成保障穩定和處理緊急事故的多邊安全協議。從東盟國家的經驗看來，她們最少必須花上幾十年才可能建立互信和共同作業的基礎，藉以達成能迅速處理緊急事故的集體安全協議。

在南韓，主要的計劃者以歷史視野預見一個可能來臨的年代，那就像1895年之前的幾百年，當時韓國只是個面向亞洲兩大政治和經濟巨人——中國和日本的小國。1884至1910年間，美國在亞洲尚不成氣候，不能支持韓國對抗崛起的日本。現在，深思熟慮的韓國專家則希望今天的美國在亞洲保持足夠利害關係，以維持韓國的獨立自主，使她毋須因為要靠向中國或日本，而觸怒另一方。

雖然美國政客忙於處理影響他們仕途的國內事務，但民眾對於長期維持美國在亞洲的駐軍是支持的。現在美國每年差不多要花40億美圓維持駐日部隊，另外由日本提供50億資助；此外她在南韓也要花30億，南韓則提供基地和每年付出3億，並逐年增加10%。美國國防預算每年超過2,500億，用在東北亞的費用只佔其中不足3%。美國在日本和南韓駐軍，使她能對區內緊急事故作出迅速反應，並為防範軍備競賽及可能危害鄰邦的強國威脅，維持必要的穩定局面。支持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正發動新一輪迫使政府削減預算的行動，但即便如此，他們亦不會削減國防預算。美國政治領袖很清楚東亞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地區，美國對亞洲的貿易額已超過對歐洲，而美國在亞洲的投資成長速度亦比在歐洲快。為了保護在世界上成長最快地區的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龐大利益，付出國防預算中的3%不過是寥寥之數而已。

美國政治領袖很清楚東亞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地區，美國對亞洲的貿易額已超過對歐洲。為了保護在世界上成長最快地區的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龐大利益，付出國防預算中的3%不過是寥寥之數而已。



五 恰當的中國政策：協助中國參與國際事務

找任何一位安全分析家來問一問：「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二十年，哪一個亞洲國家會擁有威脅別國的軍力？」答案會是中國。但問題應該這樣問：「隨着中國成長和現代化，其他國家要怎樣做才能照顧本身安全，和減低中國成為安全威脅的機會？」

要是我們檢討一下，德國和日本這兩大新興經濟勢力為甚麼會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走上軍事擴張的道路，就會得出兩大重要因素：第一，她們的軍事擴張主義在幾十年間沒有被認真制止；第二，其他國家和世界經濟沒有為德、日獲取天然資源和進入市場打開方便之門，因此她們只得訴諸軍事擴張政策。

中國領導人說他們並不想擺出超級大國的姿態，也沒有打算擴張到他們聲稱擁有主權以外的地方。事實上，也看不出他們在未來二十年間有能力和企圖走另一條路。然而，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而鄰國又沒有組成防衛聯盟，中國很可能擁有從事軍事擴張的能力。也許，全球經濟活動促成的聯繫繼續增加，天然資源的只須透過市場力量而不必靠領土擴張獲取，還有具大規模毀滅力量武器的銷毀，可以降低大國選擇軍事擴張政策的機會。

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會勢不可擋地持續下去，所以世界其他主要勢力的明智政策是幫助中國進行內部制度改革：發展現代的銀行、課稅、通訊、法律和公共行政制度。中國加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像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多邊組織後，就調整了行為來配合組織的宗旨，藉此鞏固該等組織，成為這些組織負責的會員。倘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信也同樣會有良好效果。毫無疑問，國際組織維持某些整體原則是很重要的，但幫助中國準備在這些組織擔任更全面的角色，將對世界和平有莫大幫助。事實上，國際間為了控制核子和常規武器擴散、遏止國際恐怖主義和毒品買賣、保護環境、執行國際維持和平任務而作出的努力，如果沒有中國參與是難以成功的。因此，整體來說所有大國都應該奉行的政策，就是大力擴展和中國領導人的高層接觸，共同合作擴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

應該這樣問：「隨着中國成長和現代化，其他國家要怎樣做才能照顧本身安全，和減低中國成為安全威脅的機會？」所有大國都應該奉行的政策，就是大力擴展和中國領導人的高層接觸，共同合作擴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

林立偉 譯

傅高義(Ezra F. Vogel) 現任哈佛大學福特社會科學講座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教授曾對廣東省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作詳細的實地研究。但他最為人熟知的工作，是對日本企業文化的深入剖析，在1979年發表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這本論著尤其膾炙人口。前兩年他一度告假離開哈佛大學，出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位，直接參與外交國際事務的策略研究，直至去年才返回哈佛出掌費正清中心主任。